

文史哲研究丛刊

徽宗朝诗歌研究

张明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徽宗朝诗歌研究

张明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宗朝诗歌研究/张明华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3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4906-1

I. 徽... II. 张...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北宋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8897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徽宗朝诗研究

张明华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淞杨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25 插页 2 字数 320,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4906—1

I·1999 定价: 4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巩本栋

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和具体进程,往往比我们一般所了解和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北宋后期,诗歌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应该说是相当艰难的。宋哲宗绍圣以降,原来熙、丰、元祐年间新旧两党在思想、政治上的激烈斗争,已逐渐演化为不同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相互倾轧、人事纠纷和意气之争,党争的性质已完全蜕变,政风颓败,民不聊生。所谓绍圣、崇宁新政,“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当政者“怀植奸党,威福在其手,托绍述之名……,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致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其名杂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所谓新法条令,在经济上,除方田法还在部分地区实行外,其余皆已成为对百姓的变相盘剥,而且即使是方田法,“非特方田以增赋税,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百缗,下户亦不下数十缗,民户因此废兴失所,饿莩者有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八)。在学校、科举制度上,崇宁三年“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至“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又“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刘攽诗话……,悉行焚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罢诗赋,使士人不学;禁苏、黄等人诗文,使人无可学;杖传习诗赋者,使士人不敢学,北宋文学发展的去路,几乎被断绝了。

然而,文学作为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惯性,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愈禁愈行的逆反心理亦往往可见。所以,宋徽宗下令禁诗赋后不久,他自己似乎就不肯受此约束,如当时人所记载的是,“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石林燕语》卷九)。“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中)。而“凡绍兴初以诗名家,皆当日人才也……。子苍诸贤,往往不由科举而进,一时如程致道、吕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八《跋韩子苍与曾公衮钱逊叔诸人唱和诗》)。这些记载,大致都是符合实际的。

那么,徽宗诗坛的总体面貌究竟如何?北宋后期除了江西诗派之外,还出现过哪些重要诗人、派别或集团?他们对南宋诗歌的发展曾起过什么作用?其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又将如何等等,就必然成为我们宋诗研究中的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多年来恰恰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仿佛北宋后期除了江西诗派之外,便再没有了其他的诗人。

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明华博士的《徽宗朝诗歌研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宋诗研究中的空白和不足。

是书在对现存徽宗朝大量诗歌作品细致研读的基础上,排比归纳,分析比较,沿波讨源,玩味寻绎,梳理出自元祐至南宋初年,宋诗发展由学苏(轼)到学黄(庭坚),再由学黄向学苏回归的大致过程;并认为,在徽宗时期,江西诗派中的许多人(不只是吕本中),如潘大临、谢逸兄弟、洪炎等,其诗风已趋于平易,这实是学习苏轼的结果。南宋初“苏学”盛行,其先兆早在北宋后期已显现出来。从苏轼一向主张自然为文的观点来看,此说是很有见地的。书中又对惠洪、饶节、祖可、善权等诗僧的创作进行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僧诗的创作极为繁荣,且同样表现出由学苏到学黄转变的迹象;对徽宗和徽宗时期的宫廷诗人,如慕容彦逢、王安中等人的创作展开论述,认为他们的诗歌在叙写自我生活的场景、描绘风景人物以及大量运用以赋为诗的手法等方面,

都突破了王建宫词创作的藩篱,雍容华丽,自有其认识价值;对集句诗、柏梁体和六言诗在徽宗朝的兴盛和变化进行探讨,以为无论在题材和主题的取向还是在创作手法与技巧的创新上,这些特殊体裁的创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对南宋初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华博士的这些观点和看法,毫无疑问,也都多有心得,足资参考。

此书是明华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并最终完成的。记得他在入学的时候,与其他同学一样,也曾各言其志。明华的愿望,是将来能够完成一部宋诗史。他此前曾对宋初的诗歌特别是西昆派的诗歌创作,进行过探索,现在,他又完成了南北宋之交的诗歌演变研究。虽然离他实现自己当初的宏愿,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虽然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许还需要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考量,但我相信,他将来是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只要他能矢志不移,不断探索,不断努力。

明华勉之!

丁亥秋于秦淮河畔

绪 言

进入新时期以来,宋代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北宋中期和南宋中期的诗歌进行的,而且多集中于少数大家身上,相对来说,对其它阶段诗歌的研究仍显得比较薄弱。本书以徽宗朝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

目前,对于徽宗朝诗歌的研究在个别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对江西诗派的研究。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系第一部研究江西诗派的专著,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外部研究。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则开始对江西诗派的内部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2003年,中国社科院的郑永晓以《江西诗派研究史》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该文不但继续对黄、陈等主要作家进行探讨,还对江西诗派在金代的影响以及后世对江西诗派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005年,四川大学伍晓蔓完成的博士论文《江西宗派研究》,对江西诗派的诸多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探讨。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虽然“论”的内容不多,但对该派12个诗人的行年、事迹作了认真的梳理和考证。重点研究南渡以后江西诗人的成果亦有白敦仁《陈与义年谱》(中华书局,1983),欧阳炯《吕本中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和吴淑钿《陈与义诗歌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等书;2006年,浙江大学白晓萍的博士论文《宋南渡初期诗人群体研究》的重点是对吕本中和曾几进行的个案研究。截至目前,对徽宗朝江西诗派以外具体作家的个案研究专著,似乎仅有张剑《晁说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和陈自力《释惠洪研究》(中华书局,2005)。总体研究的专著,也只有汪俊《两宋之交诗歌研究》(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但该书是从地域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切入,且著者关注的重

点在于作品的结集而不是诗歌的发展。相对来说,单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更广泛一些,除了江西诗派以外,研究“苏门”诗人的文章也涉及到惠洪、唐庚、苏过、毛滂、吴可、叶梦得、李之仪等几个作家。而两派以外的其他诗人则还没有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寥寥。

现有关于宋代文学或宋代诗歌的教材和专著里,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这一时期的诗歌,但往往仅仅论及江西诗派。各种版本的断代、分体中国文学史,包括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和孙望、常国武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都是如此。许总《宋诗史》对江西诗派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也同样没有涉及到江西诗派以外的其他作家。比较而言,似乎只有房开江《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一书在《江西诗派》后专立一节“新的诗人群的出现”,列举宗泽、崔鶪、唐庚、苏过、汪藻、王庭珪等人构成的一个诗人群体,这个群体实际上是以学习苏轼为主要特征的。

有些著作本身与宋诗或宋代文学无涉,但也包含了一些相关内容,对本书的写作和修改不乏借鉴意义。如诸葛忆兵的《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虽然和本书的研究对象不一致,但研究时段是相同的,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对文学背景的认识,很有启迪。又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对当时的文学思想和文人心态进行了研究;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中有专论江西诗派的内容;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研究了党争中的文人心态,其中亦涉及江西诗派的形成问题。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主要研究禅宗与诗歌的关系,对研究徽宗朝的僧诗很有参考价值。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对探讨徽宗朝诗歌的衰落与进士科考试的关系有启发意义。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四川大学成明明的博士论文《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对馆阁翰苑与诗歌关系的研究也引导我去思考徽宗朝诗歌的衰落与馆阁、翰苑制度之间的关系。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

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等侧重于考察文化对文学包括诗歌的影响,也有利于认识当时的诗歌作品。此外,有部分著作,虽然并非纯文学研究,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更好地理解当时的诗歌。如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霍然《宋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后者在论及当时美学思想时,还专门在第四章第三节“镂云裁月”探讨了徽宗朝的美学思想。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对了解当时的风俗、文化也有参考价值。

巩本栋老师关于“北宋党争与文学”的系列论文,如《北宋党争与文学》(《文献》1991年第4期)、《北宋党争与士人心态》(《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北宋党争与文论三派的分化》(《文学评论丛刊》,1998年第1期)、《北宋党争的再评价及其思想史意义》(《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北宋党争与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首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北宋党争的背景与原因》(《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北宋党争与清真词的创作》(《古典文献研究》第6辑,2003)等等,所阐发的许多见解对我认识徽宗朝的诗歌都很有启发意义。

江西诗派是徽宗朝诗歌的主流,但当时的诗人并非都属于江西诗派,以晁说之、唐庚、苏过等人为代表的苏门诗人仍有一定的势力。此外,也还有以惠洪、饶节、祖可和善权为代表的诗僧群体,以徽宗皇帝赵佶及其身边的御用文人慕容彦逢、王安中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体等等,他们的诗歌特点各不相同,共同构成了当时诗歌的基本格局。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对江西诗派的研究已经很深入,对苏门诗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除此外的诗人,包括宫廷诗人和诗僧,不仅相关专著少,连单篇文章也罕见,不少诗人甚至尚未进入今人的研究视野。就诗歌体裁而言,集句诗、柏梁体和六言诗这几种诗体都在徽宗朝前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而它们的发展及其在发展中所呈现的各种特征,又跟王安石、苏轼、黄

庭坚这几位大诗人的开拓以及他们的诗歌在徽宗朝前后的不同命运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引起论者的关注。

徽宗朝的诗歌成就,虽然不能与此前的元祐诗歌和此后南宋的中兴诗人相比,甚至不及高宗朝的诗歌,但是它不但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上接元祐诗坛,下启高宗朝诗歌的重新振起,并进而促进了“四大家”的出现,具有非常独特的过渡意义。本文以徽宗朝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总体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能更加具体地展示出当时诗歌发展的真正面貌,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期把宋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目 次

序	巩本栋 1
绪言	1
第一章 徽宗朝诗歌发展概况	1
第一节 徽宗朝的文化背景	1
第二节 徽宗朝诗歌发展的艰难环境	18
第三节 徽宗朝诗人的生活状况和创作心态	33
第四节 徽宗朝诗歌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原因	51
第二章 “江西诗派”的蓬勃发展	69
第一节 江西诗人的“宗派”特点	70
第二节 李彭：“诗体拘狭少变化”	86
第三节 谢逸、谢薖：“无逸诗似康乐，幼槃诗似玄晖”	91
第四节 洪朋：“咫尺涩如棘”	100
第五节 洪刍：“酷似其舅”	105
第六节 晁冲之：“不从古人笔墨畦径中来”	109
第三章 “苏门”影响逐渐式微	120
第一节 苏门诗歌的衰落及其原因	120
第二节 唐庚：“敢乱道却好”	131
第三节 苏过：“峻壮有家法”	138
第四节 毛滂：“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	144
第五节 吴可：“回首长安泪满衣”	151
第四章 诗僧创作的世俗化和多样化	160
第一节 惠洪：偏于学苏，自然雄壮	165
第二节 饶节：千锤百炼，清淡峭拔	173

第三节 祖可与善权:“流风回雪”与“风雷为舌”	181
第五章 宫廷诗人创作的纪事性和富丽色彩	192
第一节 赵佶:《官词》的新发展	193
第二节 慕容彦逢:不同诗体,差异巨大	206
第三节 王安中:诗歌的“赋化”	216
第六章 徽宗朝诗歌的反正	226
第一节 南宋初年江西诗人对“宗派”的突破	226
第二节 韩驹:苏、黄诗风的融合	240
第三节 吕本中:从“有意于文”到“无意于文”	246
第四节 陈与义:开创“新体”	253
第五节 曾几:自然清新的新诗风	261
第七章 集句诗、柏梁体与六言诗在徽宗朝前后的发展	268
第一节 王安石与集句诗在徽宗朝前后的发展	268
第二节 苏轼与柏梁体诗歌在徽宗朝前后的消长	286
第三节 黄庭坚与六言诗在徽宗朝前后的兴衰	300
余论 徽宗朝诗歌对南宋诗歌的影响	320
附录一 北宋集句诗人林震考	326
附录二 “吴可”名称考	331
附录三 “饶节”、“饶次守”本是一人	334
主要引用和参考文献	336
后记	343

第一章 徽宗朝诗歌发展概况

北宋诗歌发展到哲宗元祐前后,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时诗人众多,成就斐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人为其翘楚。但从哲宗皇帝“亲政”打击旧党以后,诗人多被贬谪,诗歌的发展随之受到严重摧残。到了徽宗朝,新党对元祐旧党的打压变本加厉,大多数诗人处境可危,甚或惨遭迫害。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诗歌仍在发展,并且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徽宗朝的诗歌成就虽然不算太高,但上接元祐诗歌的繁荣,下为南宋初年诗歌的发展积蓄了人才,准备了条件,具有突出的过渡特色。

第一节 徽宗朝的文化背景

徽宗皇帝赵佶从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即位,至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内禅,在位整整26年。徽宗退位实因朝政内外交困,亡国在即,于是把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丢给了儿子。国事糜烂至此,钦宗皇帝也无回天之术,于是仅仅过了十二个月,至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都城就被金人攻陷;又过了五个月,到靖康二年(1127)四月,徽宗、钦宗以及皇后、王子、宗室等被金人掳掠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徽宗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存在巨大的失误:对内,他追求声色享乐,重用蔡京、王黼等奸邪之辈,在江南大兴“花石纲”之役,严重摧残了江南的经济,终于酿成了破六州、五十二县的方腊之乱;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并为此加重赋税,以致民生凋敝,北方盗贼四起,特别是最后几年联金灭辽,不仅自毁北方的屏障,而且把自身

的矛盾都暴露在金人面前,刺激了金人的胃口,终于招致了亡国之辱。但是,从总体情况来说,徽宗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天下承平,城市经济继续得到发展,文化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审美思想发生突出变化,这些对当时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城市经济高度繁荣

徽宗即位时,北宋已立国 140 年了。太祖皇帝确定的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和多数皇帝尽量避免对外战争的做法,保证了较长时期的太平局面,从而实现了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尽管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开启的新、旧党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内耗,延缓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并没有改变其继续发展的趋势。新、旧党争到徽宗初年已接近尾声,最后新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对外,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利用国家积累的财富,不断发动战争,仅崇宁、大观年间的战果就有:崇宁二年六月,复湟州、廓州;三年四月,复鄯州;四年正月,秦凤蕃猷邦、潘、叠三州;三月,复银州;大观二年四月,复洮州;五月,复积石军。为了支撑对外战争所需要的庞大军费开支,朝廷加大了对农民的赋税,从而动摇了社会的基础。对内,蔡京诱导徽宗提倡骄奢享受,《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载:“时四方承平,府库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如粪土。屡朝所储,大都扫地矣。”^①但在较短的时间里,城市经济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更加繁荣。宋代的城市比唐代繁荣得多,唐代 10 万人左右及以上的城市约有 20 个左右,而宋代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城市就有 40 个左右,汴京的人口超过 100 万。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汴京的居民人口远远超过唐代的都城长安。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开封的商业行当至少有 160 个以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1103)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

^①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37 页。

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輶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①

徽宗朝外部战争连续取得胜利,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就,皇帝和新党醉心于所取得的“文治武功”,整个社会一片歌舞升平。徽宗朝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皇帝本人有意要“与民同乐”有关。当时对元宵节的高度重视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当时汴京元宵节的情况说:

国朝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彩山,故隶开封府仪曹及仪鸾司共主之;崇宁后有殿中省,因又移隶殿中,与天府同治焉。大观元年,宋乔年尹开封,乃于彩山中间高揭大榜金字书,曰:“大观与民,同乐万寿。”彩山自是为故事。随年号而揭之。②

孟元老描写当时的盛况更加具体:

正月十五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

①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3页。

② [宋]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17页。

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矾上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水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①

元宵观灯在徽宗朝达到极盛。元宵节观灯是宋代社会各阶层生活中的大事,在时人的诗、词创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据宋人张知甫《可书》记载,宣和二年,徽宗在宣德门设宴。徽宗命以“五门端阙”为题令赋诗,安中即席应制,曰:

斗城云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缯嶽千峰连璧月,珠帘十里晃灯莲。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盛世亲逢叨四近,颂觞连日缀群贤。^②

除了这种应制之作,文人们有关元宵的文学创作也举不胜举。为了防止元宵节下雨影响观灯,还出现了“预赏元宵”的情况。元人凌准的《餘臞日疏》载:“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腊月初一日放鳌山灯,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夜,谓之预赏元宵。徽宗至日出观之。时有谑词,末句云:

^① 《东京梦华录》卷六,37—38页。(以下凡同一种书重复出现,均只注书名、卷数和页码。)

^② [宋]张知甫《可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398页。

‘奈吾皇不待元宵来到，恐后月阴晴未保。’”^①预赏元宵也同样能引发有关的诗歌创作。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载：“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宴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书侍郎冯熙载为诗以进。”^②民间则有《贺圣朝》一词的出现，即凌准所提到的那首“谑词”，今存。

元宵观灯只是一端，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宗朝汴京的繁荣和富庶。又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风俗画，却非常直观地展现了当时汴京清明节工商业的繁荣和各行各业的活动。其它城市虽然不可能发展到汴京这样的程度，但较以前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教合一”的独特面貌

就思想学术而言，徽宗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有不少创新，显示出独特的面貌。其主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王氏新学继续作为官方哲学，而理学也已初步形成。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北宋与汉代以后的历代王朝取向一致。但宋人一反汉、唐经学注重注疏的传统，转以阐述义理为主，形成了与“汉学”对立的“宋学”。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即新经学。王安石在神宗朝主持了变法，王氏新学就成了新党执政时的治国学说。《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载：

（元丰）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上进。帝谓之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义，其颁行，使学者归一。”遂颁于学官，号曰《三经新义》。一时学者无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安石又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③

① [元]凌准《舂舂日疏》，[元]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一上，文渊阁《四库全书》877册，669页。

② [宋]王明清《挥麈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669页。

③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106页。